

# 筑就我们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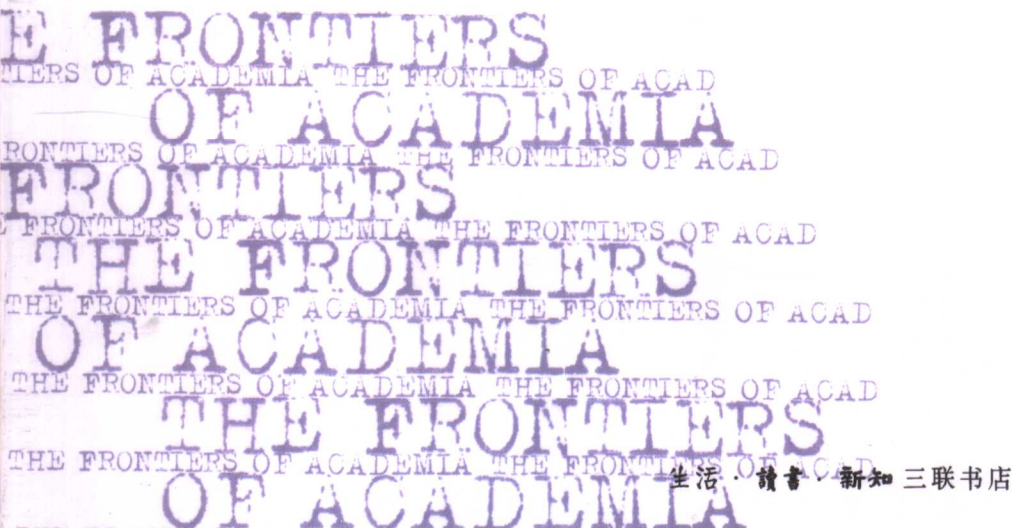
## 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Richard Rorty**

[美] 理查德·罗蒂 著  
黄宗英 译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 筑就我们的国家

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

[美] 理查德·罗蒂 著

黄宗英 译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 / (美) 罗蒂著；  
黄宗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  
(学术前沿)

ISBN 7-108-02379-2

I. 筑... II. ①罗...②黄... III. 民权运动-研究-  
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9219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特约编辑 许海燕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2-2684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2月北京第1版  
200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 数 100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14.80元

# 学术前沿

##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创新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 目 录

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与杜威 .....	1
改良左派的衰落 .....	31
文化左派 .....	55
<b>附录</b> .....	<b>79</b>
社会运动与政治活动 .....	81
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 .....	92
<b>致谢</b> .....	<b>104</b>
<b>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b> .....	<b>张旭东 106</b>
(评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	

## 美国的民族自豪感： 惠特曼与杜威

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然而，过分的民族自豪感可能激发好战情绪或者导致帝国主义倾向，就像自尊心太强会产生傲慢的态度。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尊不足，他就很难展现自己的道德精神。因此，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就难以形成有关国家大计的富有成效的辩论。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政治筹划方面富于想像力和创造力，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因国家的历史或现行的民族政策而产生的强烈耻辱感或炽热自豪感。当然，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压倒民族耻辱感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种情感倾注是十分必要的。一些人和我一样，希望美利坚合众国有一天将其主权让给丁尼生所谓“人民的议会、世界的同盟”，对他们而言，这种倾注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除非各个民族—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建立这么一个同盟，除非这些民族—国家的公民都为自己政府的行为感到骄傲（即便是这种骄傲带有遗憾、有所保留），这种同盟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那些希望自己的国家有所作为的人必须告诉人们，应该以什么而自豪，为什么而耻辱。他们必须讲述富有启迪性的故事，叙说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任何国家都必须忠

于自己的过去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塑造民族历史的形象,去叙说民族过去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就是民族自我认同的不同故事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是代表民族伟大精神的不同形象之间的竞争。

在 20 世纪末的美国,值得推崇的动人形象和故事还是寥寥无几。惟一受美国公众文化推崇的民族自豪模式,就是既头脑简单又好战激进的大国沙文主义。然而,民众普遍认为,民族自豪感已经不再适时。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就连沙文主义也显得黯然失色。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意识中,人们对 21 世纪美国形象的描述都很低调,充满了自我嘲讽或反感。

我们来看看最近出版的两本小说:一本是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畅销书《雪崩》(*Snow Crash*);另一本是莱斯利·马门·西尔克(Leslie Marmon Silko)的《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读者不多但备受评论界青睐。两本都是力作。不论哪本书的读者都会认为,如果美国人继续因他们的国家而自豪,那将会很荒唐。

《雪崩》讲述的是 21 世纪美国的故事,到那时,企业家的需求将凌驾于人们建立自由平等社会的愿望之上。国家已经分裂成为众多享有特许权的领地,各个独立的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Mafia、GenTech——在其领地内拥有各种司法权力。美国政府也已经进入商界,而且以更为合法的实体经营着自己的小块领地。但是,政府在各个平等的实体中并无优先权。在这个国度里,不存在压倒一切的政治实体,更不用说这样的公民意识,可以联合东西各州,或者联系各大城市的不同城区。

在小说《雪崩》中,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象征是斯蒂芬森最恐怖的创造——他称之为“木排”。这是一个漂浮在海

上的船骸巨怪,不停地在大西洋的岸边漂浮。那里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亚洲人,他们希望逃离巨船,游向北美。那条木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巨大的国际贫民窟,被粗暴残忍、无法无天的罪犯帮派所控制。在昔日的美国,各大企业享受着特许经营权,利润丰厚,他们都有各自的地盘,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这与木排上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因此,美国人与其说是因成为美国公民而自豪,不如说因比在那条木排上生活的更安全、更温饱而感到庆幸。林肯和马丁·路德·金从斯蒂芬森小说里的美国人想像中消失了,就像克伦威尔或丘吉尔从奥威尔《1984》这本书中描述的英国人想像中消失了那样。

《雪崩》着重刻画了人们普遍认同的思想,认为那些巨型公司和在幕后充当这些公司代理人的政府现在制定所有的重大决策。这种思想常常被写进一些恐怖小说,如理查德·康顿(Richard Condon)的《满洲候选人》(*Manchurian Candidate*)和《冬季谋杀》(*Winter Kills*),以及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葡萄地》(*Vineland*)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妓女魂》(*Harlot's Ghost*)等一些更有抱负的作品。人们眼前的政府不过是一幅假面具。这种观点似乎是一种貌似真实的推断,因为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时代(Second Gilded Age)。即使是马克·吐温也会为我们的政客们出卖自己的无耻行为而感到吃惊。<sup>①</sup>

---

① 这种交易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参议院投票支持对法律进行特别的修改,以此阻挠卡车司机联合会(Teamsters Union)组建联邦快递公司(Federal Express Company)。参见参议员 Edward Kennedy 的发言引发的与此有关的辩论(*Congressional Record*, October 1, 1996, pp. S12097ff),尤其是参议员 Paul Simon 的发言:“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联邦快递的问题如今在国会这么受重视?说实话,是因为联邦快递对竞选活动的贡献很大。”(p. S12106)参议院投票支持该公司后,据说该公司发言人表示:“我们在政治上打了一场硬式棒球,并且赢了。”



斯蒂芬森、康顿、品钦等人的小说并非对社会的抨击，而是对种种美国梦破灭的充满悔恨的默认。西尔克的《死者年鉴》同样设想民主政府已经成为一场闹剧，然而她的小说表现为自憎而不是自嘲。小说着重刻画了欧裔美国人与土著美国人以及非洲移民奴隶后代之间的关系。西尔克小说的结尾描写了欧洲侵略者和移民的后代被迫返回欧洲，因此实现了土著美国人的预言，认为白人不过是暂时的灾难，不会超过五百年的历史。西尔克刻画了美国政府由于暴乱和粮食短缺而瓦解，而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后代却源源不断地涌入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

我们不需要知道西尔克是否读过福柯(Foucault)或者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著作，也明白她的小说描述的是近代史，就像福柯和海德格尔的读者从他们的著作中读到的一样。在这部小说中，两百多年美国的历史——乃至启蒙运动以来欧美各民族的历史，已经浸透了虚伪和自欺欺人的事实。福柯的读者常有这样的印象，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人们没有挣脱任何枷锁：往日沉重的枷锁不过变得稍稍轻松些。海德格尔将美国成功地用现代技术包围整个世界描写成荒原的蔓延。相信福柯和海德格尔的人常常会像西尔克那样看待美利坚合众国：希望以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来取代它。

这些人没有因为拥有美国公民权而感到自豪，而且认为积极投身选举政治毫无意义。他们将美国的爱国主义和残暴行为相联系：非洲奴隶的输入、对美洲土著人的残杀、对原始森林的践踏，以及对越南的战争等。许多人认为，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只适用于大国沙文主义，因为在有些人眼里，美国仍然可以精心编制如同海湾战争那样的事情，这些美国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给

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当青年知识分子在读了海德格尔、福柯、斯蒂芬森或者西尔克的作品后,观看约翰·韦恩的战争影片时,他们往往深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残暴、没有人性、腐朽的国家里。他们开始把自己当作剩余的拯救力量,是少数能够透过民族主义的外衣洞察当代美国丑陋现实的人。但是,这种洞察力没有使他们制定一项合法的计划,或者参与政治运动,或者分享民族的希望。

当我们把《雪崩》、《死者年鉴》等小说同 20 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丛林》(*The Jungle*)、《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等社会主义小说相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体现的“民族自嘲和自憎”与“民族希望和理想”的对立十分鲜明。在后一种小说中,作家们都相信,葛底斯堡演说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的国家必须改造自己以实现林肯总统的梦想。这种改造是必须的,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已经使美国人早期的个人主义思维方式显得过时。

这些作家认为,个人主义思维方式应该被另外一种信念所代替,即美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人民管理的共和国(*commonwealth*),第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国家中,人们的收入与财富平均分配,政府不但保证机会均等,而且保证个人自由。这种新的、半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是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和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的核心思想。它为 20 世纪前 60 年的美国左派政治定下了基调。我们会看到,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为形成这种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20 世纪初左派知识分子与他们同时代占多数的反对者之间的不同,就像行为者与旁观者之间的区别。在这个世纪前些

年中,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正视自己国家的历史并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历史,那么,他/她就有可能提出某种新的政治观点。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当然是个明显的例外,他自觉地放弃政治。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亚当斯将第一个镀金时代诊断为不可逆转的道德与政治沦丧,是不合情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詹姆斯关于真理的实用主义理论是对亚当斯所影响的那种超然的旁观主义的反驳。

对詹姆斯来说,憎恨美国人的虚伪和自欺欺人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这种行为旨在给美国一个将来能够以此为荣的理由。在詹姆斯看来,亚当斯培育的那种具有原始海德格尔精神的文化悲观主义似乎既颓废又怯懦。詹姆斯说:“民主是一种宗教,而且我们注定不能允许它失败。信念和乌托邦理想是理性最崇高的表现。任何一个富有理性光辉的人都不会听天由命。”<sup>①</sup>

1909年,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在其《美国生活的诺言》(*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一书的开头印证了亚当斯的观点:

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信任是宗教性的。这种信任如果说不是非常强烈的话,那么至少具有几乎绝对和普遍的权威。……孩提时,我们就听到长者在谈话中断言或者暗含这种信任。在我们教育过程的每个新阶段,这一观念都不断被强化。……我们可以不信任或者不喜欢我们的同胞以国家的名义所做的许多事,但是我们的国家本身、其民主的

---

<sup>①</sup> William James,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College-Bred", 收入 James 的 *Essays, Comments, and Review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9 页。

制度和光辉的前途是不容置疑的。<sup>①</sup>

如果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平民宗教是美国人的属性,那人们会认为他仅仅是指沙文主义者——是指那些把约翰·韦恩而不是林肯当作我们的代表人物的美国人,他们把美国看成是不可战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善良的民族。西尔克、斯蒂芬森、梅勒和品钦的小说和亚当斯听天由命的悲观主义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现代美国左派分子很少引用林肯或者惠特曼的语录。现在已经不像克罗利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教育过程的每个新阶段”,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信任“都不断被强化”。相反,当代美国大学生毕业时,可能比刚入学时更加怀疑自己国家未来的命运。她可能不再相信政治进取精神能够创造这样的未来。那种超然的旁观主义和认为美国公民权不再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机会的思想,似乎已经进入这些学生的灵魂。

在第一讲中,我将描述惠特曼和杜威在构筑越战前美国左派分子普遍认同的美国形象时的角色。我使用“形象”而非“神话”或“意识形态”等词语,是因为我认为要讲述美国的历史,不存在任何非神话的、非意识形态性的方法。我们称故事是“神话般的”或“意识形态的”,这只有当那些故事和“客观的”故事相对立时才有意义。人们设法找到实现目标的办法时,往往预测一种行为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客观性会有所帮助。但是,在人们决定要成为什么人或者建立什么样的国家

---

<sup>①</sup> Herbert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4; 初版于1909), 1页。

时,就与客观性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当人们试图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捉摸历史的真正意义时,谁也不知道客观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和回答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的所做所为真正带来了什么结果等问题是一样的。在决定我们下一步做什么、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过程中,我们会就个人或国家命运提出一些问题。

作为讨论这种决策过程的例子,我们来看看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小说《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小说的开头写道:“这是我对我的国家和同胞所犯罪行的指控。我本人、时间和历史永远都不会宽恕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并且仍然在毁灭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一切。”<sup>①</sup>这种缺乏宽容的态度很容易就能从全美伊斯兰联盟(Nation of Islam)的神学故事中找到原型。鲍德温把全美伊斯兰联盟的创始人伊莱贾·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当作一个偶然的发现。黑人穆斯林认为,白人开始是由魔鬼般的科学家创造的一群侏儒。对他们来说,这种假设最能够解释惨无人道的黑奴拍卖和对黑奴实行私刑杀害。

那些能够接受伊莱贾·穆罕默德故事的人,便利用它来表达自己对美国白人那种发自内心、摧人心肺的愤恨之情,正如沃尔克的小说里所刻画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詹姆斯·鲍德温小说中的自创意识逐渐展开时,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他长期以来不愿意宽恕这个国家,因为当初自己的祖先是被镣铐绑架而来的;另一方面,他与这个国家的认同感与日俱增。因此,他努力地把这两种情感融合在一起。他说:“我不是美国的监护人,

---

<sup>①</sup> James Baldwin, *The Fire Next Time* (New York: Dell, 1988; 初版于1963), 5页。

而是最早来到此海岸的美国人之一。”<sup>①</sup>

在另一个段落中，鲍德温又写道，“简言之，如果我们想真正成为一个民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正塑造我们的形象，成为像成年的男女一样成熟的民族，那么我们，不论黑人还是白人，在这块土地上彼此都迫切地相互需要”。<sup>②</sup> 他的书是以这句经常被引用的话结束的：“如果我们——我现在指的是相对觉醒的白人和相对觉醒的黑人，我们必须像情人一样坚持到底，或者唤醒他人的觉悟——不再动摇我们的责任，那么，尽管现在人数还不多，我们也许可以结束这场种族歧视的噩梦，筑就我们的国家，并改变世界的历史。”在如何把握国家命运这个问题上，伊莱贾·穆罕默德和詹姆斯·鲍德温是有分歧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是充当旁观者、不顾非人性力量下美国的命运，还是成为国家命运的主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他们两人的观点哪个是正确的。他们两人从不表示谅解，但是其中一个拒绝致力于筑就我们国家的工程，而另一位却没有那么做。这两种观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也都言之成理。但是，我们找不到中立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这两种观点哪种更为正确。

就像我认为没有必要证明詹姆斯·鲍德温的观点是否正确一样，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证明林肯、惠特曼或者杜威是否正确地认识美国。描写一个民族经历过什么又试图成为什么，不应该只是准确地再现现实，而应该是努力塑造一种精神认同（moral identity）。左派和右派之间不应该就我们国家历史中

---

<sup>①</sup> James Baldwin, *The Fire Next Time* (New York: Dell, 1988; 初版于1963), 98页。

<sup>②</sup> 同上, 97页。

哪些片段值得骄傲、就这段历史的描写是否真实而进行争论，而应该探讨哪些希望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哪些幻想是我们应该放弃的。

只要我们的国家还存在政治上活跃的左派和右派，这种争论就会继续下去。它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不过左派有责任使之继续下去，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右派人士认为，国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虽然过去可能更好些。他们认为，左派为争取社会正义所进行的斗争是胡闹，是乌托邦式的愚昧。就理论而言，左派是有希望的政党。它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的形象尚未形成。正如历史学家尼尔森·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所说的：“所有美国的重大改革运动，从反对奴隶制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劳工运动，改革者都标榜自己是道德的、爱国民族主义的卫士。他们不同于那些目光狭隘、自私并且同正义高尚的社会前景背道而驰的精英阶级。”<sup>①</sup>

如果左派成为旁观者，沉浸在对过去的回顾中，那就不再是左派了。在这些讲座中我会说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会(unions)之间原有的联盟决裂之后，美国左派开始向亨利·亚当斯的立场转化。学院中的左派已经允许文化政治代替真正的政治，并且同右派合作制定公众辩论的主要文化议题。他们正花费精力来讨论诸如亚当斯对处女和发电机的思考等远离国家需要的话题，而这些精力本应该用以提出新的法律。学院左派没有议案可以提交给美国，也没有现实的通过具体改

---

<sup>①</sup> Nelson Lichtenstein, *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Detroit: Walter Reuther and the Fate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383 页。

革可以建立共识的国家形象。它的成员无法再感受到詹姆斯和克罗利话语的力量。对他们来说,美国的平民宗教似乎是气量狭窄陈腐守旧的民族主义。

惠特曼和杜威也是这种平民宗教的先知。他们重新描述了美国的历史,希望动员美国人积极参与政治。他们对我们国家的重新描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彻底的现世主义(secularism)。<sup>①</sup>过去,在大多数激励本国人民进行自我完善的故事中,都离不开对于一神或多神的信仰。在多数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中,各个国家都要扪心自问,他们在基督教上帝眼中的形象如何。“美国例外论”通常认为,神祇对他们情有独钟,正如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和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作品中表现的一样。恰恰相反,伊莱贾·穆罕默德和莱斯利·马门·西尔克是倒置的例外论的代表:在他们眼中,美国白人将冒犯特有的神祇。

杜威和惠特曼想要美国人继续认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都不想同神祇宠爱或者愤怒扯上联系。他们希望把基督教圣经力主的互助、友爱同家世、不朽、天意以及最重要的原罪等

---

<sup>①</sup> 我用“现世主义”指“反教权主义”而不是“无神论”。A *Common Faith* 中明显流露出 Dewey 对“放肆的无神论”的憎恶。我在别的书中说过,Dewey 和 James 都想调和实用主义和宗教信仰——私人化的宗教信仰而不是那种产生了教会——尤其是带有政治立场的教会——的宗教信仰。参见 Rorty, “Religious Faith,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and Romance,” 收入 Ruth Anna Putnam 编辑的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lliam Ja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同著者的 “Pragmatism as Romantic Polytheism,” 收入 Morris Dickstein 编辑的 *The New Pragmatism*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同著者的 “Religion as Conversation Stopper,” *Common Knowledge* 3 (Spring 1994): 1~6。最后一篇文章回应了 Stephen Carter 的观点,即公共广场上应该听得见宗教的声音。



超自然的观念区别开来。他们希望美国人通过美国自己的努力对美国自身感到骄傲,而不希望美国屈服于任何权威——即使是上帝的权威。惠特曼这样写道:

我向人类呼唤,不要对上帝感到好奇  
因为我对每个人好奇,但不对上帝感到好奇。<sup>①</sup>

惠特曼认为,没有必要对上帝好奇,因为没有有一个标准——哪怕是神圣的标准——来衡量一个自由人所做的决定正确与否。他希望美国人花费精力去探索各自的欲望,就像过去的人类社会费力发掘上帝的愿望一样。美国人会对其他的美国人感到好奇,但不会对任何宣称凌驾于美国之上的权威感到好奇。

肯尼思·罗克罗斯(Kenneth Rexroth)认为,惠特曼创建了这样的观点,“美国梦的实现是一种天启,是给人类生命带来终极价值的末世事件”。他继续说:

其他的宗教是基于爱的公社、和平的住所以及上帝的王国等许诺而建立的。惠特曼把他的民族—国家和自己视为一体。只有当这些观点开始于3000年前的利未沙漠(Levantine desert)时,我们才能接受。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怀疑这些观点带有危险的恶意。但是,惠特曼的预言

---

<sup>①</sup> *Leaves of Grass*, 85页。所有涉及 *Leaves of Grass* 和 *Democratic Vistas* 的内容参考的是 Walt Whitman 的 *Complete Poetry and Selected Prose*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2)。